



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

陈恭禄著

中 华 书 局

1982年·北京

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

陈恭禄著 陈良栋整理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1 3/4 印张·275 千字

1982 年 8 月第 1 版 1982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5,000 册

统一书号: 11018·1043 定价: 1.30 元

出版说明

本书原为陈恭禄教授生前在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时的讲义。1964年曾由南大印行少量，供内部参考。现经陈先生之子陈良栋同志交我局出版。他在原印本基础上增编了目录提要，并对个别字句作了更改。

中华书局编辑部近代史编辑室

1981年8月

内 容 简 介

本书主要是介绍有关中国近代史史料，将其分类说明，如公文档案、书札、日记、回忆录、笔记、诗歌、传记、报刊等类，并评论它的价值，兼及纪传史、地方志及典章制度等。

在内容上，作者所介绍和评论的史料，绝大多数是作者亲眼所见的，因此，比较可靠。

在篇首，作者还写了绪论。在绪论中，作者叙述了中国史料发展的概况，讨论了史料真实性的问题；同时，对如何阅读史籍，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最后一章，略述论文的写作方法。

目 录

原序.....	1
---------	---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中国史料发展的概况.....	5
第二节 对于史料的想法.....	15
第三节 史料真实性的问题.....	23
第四节 关于阅读史籍的几点意见.....	35

第二章 公文档案

第一节 公文档案的看法.....	46
第二节 圣训和实录.....	56
第三节 方略.....	68
第四节 奏稿及电稿等.....	72
第五节 外交史料.....	87

第三章 公文档案(续前)

第一节 太平天国史料	102
第二节 新刊印的档案史料	128
第三节 存在的问题	141

第四章 书 札

第一节 书札概论	148
第二节 书札重要的几个事例	161
第三节 真迹手札	183

第四节	家信	190
-----	----------	-----

第五章 日记及回忆录等

第一节	日记	199
第二节	自订年谱	220
第三节	回忆录	231

第六章 记 载

第一节	时人记录	244
第二节	笔记	251
第三节	诗歌	256
第四节	报刊	268
第五节	史料选集	278

第七章 正史及其他

第一节	纪传史	290
第二节	年谱	301
第三节	地方志	310
第四节	典章制度	319
第五节	外人编著史籍的事例	332

第八章 结论——写作

第一节	考证	342
第二节	分析与综合	347
第三节	体裁与技巧	354

原 序

我在南京大学讲授中国近代史史料介绍一门课程，苦无教本，乃因需要而编写提纲，经过数年来的修改，并充实内容，成为文稿，定名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初为七章：第一章为绪论，第二至七章分别评介各种主要的史料。后以研究史料为写作论文或为著书立说准备条件，这门课程原为同学熟习近代史史料，并能利用它进行初步分析批判，为将来独立研究树立基础；现在同学在学习时期，练习写作，写作论文的方法和步骤，是他们极关切的事件，当有简略说明的必要。我添写了一章，怎样运用史料，名叫写作，成为第八章。我们知道历史论文写作，是史观和史料结合的具体成果。历史是党性极强的社会科学，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史观统率史料是正确的看法。历史著作价值的高下，史观常为关键性的问题。本书则以介绍史料为主，读者仍当重视史观。书为历史系学生读物，兼供一般爱好历史读者的参考书。

近代史史料，是多种多样的。古语“汗牛充栋”，不能形容它的数量巨大，还有不断的新发见。史料的储藏，虽比较集中于大城市，但也分散于各地，绝不是一人的时间和精力所能尽见，或全行阅读。我们所讨论的范围，仅就史料的类别，胪列其重要有代表性的，作为例证说明。扼要地说，本书注重第一手史料的介绍，即所谓原料，以当事人所作的报告或记载为主；当时人记其见闻而撰著的书籍，次之。更有一书兼有二者的。当事人记述其亲身的遭遇，

就其所知事的情节而论，虽不够全面，但是亲身的见闻，同于事物的观察记录，常比较翔实可信。若系传闻，我们当追问材料的来源，如信息闻自何人，来自何时何地，说者和事迹有何关系等。就我们的经验，平日所知的事迹多来自传闻。直接观察而写录下来的记载，于人类社会，仅是知识中一小部分。即就当事人观察而论，人们所受的教育和训练不同，观察事物，常“知者见知，仁者见仁”。观察家记录发生的印象，既有轻重详略的不同，写作距离事件发生时间的迟早，对于记载的真实性，也有关系。如记载早些，则记忆犹新，历时稍迟，可能便有遗忘。人们记忆力的强弱，常因年龄的高下而有不同，这是客观事实，致记载有一定的局限性，甚至于错误。

从主观方面来说，人们生活在阶级社会里，受到生活习惯、传统势力的影响，和思想意识的熏陶，培养成为是非、好恶的标准，为其代表的阶级服务，所写作的论著和记载及对于事物的看法，是阶级立场观点的表现，流露于字里行间。斗争强烈时期，更情感用事，失去理智，所作记载成为诬蔑、歪曲的文字。故史料是社会的产物，现实的反映，这是肯定的事实，记载杂有偏见，势所必然。同时，当事人也不可能明了事迹的全面，只能记述其所知的情节。我们用为史料，固当运用阶级观点，对它进行分析批判，也应该参考多种记载，求得事的真象，并能相互补充，相互证明，才能了解事迹过程的全面。

审查史料的真伪，所记情节的虚实，属于考证学的范围，也是研究历史常用的技术方法。我们介绍史料，往往论及它的价值。史料价值的高下，不在作者文字表达的技巧、结构组织的能力，而以记载事迹的真实性为主要的标准。历史工作者从史料中肯定事迹的情节，根据他论著的主题，选择所需要的资料，按照时间先后或其他办法，把它组织起来，更用史观贯串其中，叙述事迹的始末，

并说明它的因果及内在的联系，成为著作。考证常为历史写作创造条件。要之，我们介绍史料，不但讨论记载的真实性，还须进一步的分析它的内容。每一记载中有作者的亲身见闻，也有闻自他人，甚或为当时的传说，材料可信的价值各不相同，作者可能将其拼凑而成。我们对它进行研究时，必须参考其他记载，辨别其所记情节的出入，追求其造成的原因，绝不能因一段正确，即谓其他各段都是正确，也不能因某节所述错误，而谓其他各节也是错误，而必须本于实事求是的精神，逐一地进行考证，肯定它的是非虚实。本书仅能举例说明，作为示范。读者平日对于史料追问到底，并多所练习，积久便能鉴别史料。

史料介绍的方法有二：一、按照大事，说明它的主要材料，内容同于专题史料，将其逐一介绍，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捻军等等。另一方法，对于每一种类史料，作综合性的说明。如关于外交史料，我们列为一节，分别叙述三朝《筹办夷务始末》、《清季外交史料》、故宫博物院刊印的各种《清代外交史料》，及中外条约等书。我们认为第一方法，区别近代史上的大事，往往不够全面。大事标题下所列举的史料，前后或不免于重出。且同一性质的史料，一再言之，常不为人所欢迎，致效率不高。第二方法，把性质相近的史料，聚为一类，作综合性的讨论，使读者知道史料的内容及其所在地，自行搜集所需要的资料，为独立研究创造有利的条件。本书采取后一种介绍的方法，把主要的史料分别叙述于第二至第七章。

中国近代史史料种类既多，数量又大，还有我们所不知道的，诚所谓“浩如烟海”。我限于政治理论水平和业务知识，全面地说明近代史史料显不可能，只能就所知者作简略的介绍，错误在所难免。文稿写成，同事茅家琦先生及儿子良栋皆曾阅读一遍，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旧西北大学同事陆懋德先生所著《史学方法大纲》，对于我更有影响，皆表示谢意。但书中发生的错误和存在的

缺点，与任何人无关，概由我负责。读者有所批评教正，我将不胜欢迎，并愿修正。

陈 恭 禄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作于南大

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中国史料发展的概况

史字的演变。最早的史籍。记载和历史的区别。史籍的激增。六经皆史说。子书。集部。取材贵博。外国记载和外交文件。历史应作多方面的研究。

史字的演变 我国古代，史是一个官名，并非书名。古人称记载时事或相类的事迹为书，并不称它为史，关于虞、夏、商、周的记载，都称做书。东周时代称国史为春秋，周末才有史记的名称，意谓史官的记载，但它的使用，并不很广。司马迁所著史书，今称《史记》，汉人称为太史公，或称为太史公记，或称为太史公书。从汉代直到隋代，国史都称作某书、某记，唐人开始称史，相沿迄于现代。

埃及、巴比伦的史籍，都作于祭司，论者有史学家出于祭司的说法。我国史官最早的职守略同于祭司。商代史官掌管甲骨文记载，其中绝大部分是贞卜的文辞。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汉为太史令；自言他的职守和地位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①这是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所言，杂有怨愤之意。司马迁重视他的著作，欲继承孔子所修的《春

^① 《汉书》卷62《司马迁传》。

秋》，称其“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太史令属于太常。太常是汉代九卿之一，职管宗庙，祭祀鬼神，属官有博士。博士教授生徒，传播知识，太常是当时学问的集中地。时人谓星历有鬼神主宰，预示吉凶；天人之际产生于天人相感的说法，是宗教思想意识的表现，也是远古习惯制度的遗存。史官的地位并不如司马迁所言的低微，它在远古有丰富的历史知识，是统治者的顾问或亲臣。

最早的史籍 史官所作的史书，存于今者，《春秋》是最早史籍之一，史书通称春秋。史官按年月记载大事，略同于后世所编的大事年表，或更比年表简略。史官记载有一定的成法，涵有褒贬的意义，为统治阶级服务。孔子用鲁史《春秋》教授生徒，《春秋》由儒生保存，成为《六经》之一。战国时代编写的史书如《竹书纪年》，和《春秋》体裁相同，成为国史的正体。其史文简略，由于漆书于竹简或其他贵重材料，势不能详尽，也由于文字技术还未高度发展，表达的水平较低。《尚书》是古史的另一体裁，成为儒家的经书。儒书遭受秦火及挟书禁令的摧残。汉初儒生继续传授《尚书》，内容是虞、夏、商、周史料。虞书、夏书是后人所伪造，不是东周以前的记载，是肯定的事实。一部分商书和周书的真实性也有问题，惟《殷盘》、《周诰》无疑的是商周遗文，可能是史官的记录，以一事为一篇，记载较详，归史官保管。后演变为《国语》体，《国语》在汲冢发现，系周末人所作。全书以国分类，以事为篇，按年代先后编成。《战国策》也仿造这种体裁成书。

此外，还有纪传史体，即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它的内容有本纪、年表、书、世家和列传。本纪按照一代或某王统治时期，列举其国内发生的大事，近于大事表。《史记》有十年表，胪列王、侯、将、相的事迹于表内，便于检查。《史记》有书八篇，中有抄自他书的。司马迁所作诸篇，分述宗教思想意识，社会经济情况，财政困难及

政府的紧急措施,提供研究西汉前半期的重要史料。世家、列传记载王、侯、将、相及社会人物的活动事迹。《史记》是古代伟大的历史著作,后人编写的纪传史,都采用它的规模,二十世纪初叶编纂的《清史稿》,也是这样。

记载和历史的区别 从史籍内容来说,绝大部分偏于帝、王、将、相的故事,或社会上层人物的活动事迹。明显的原因:远古史官由统治者任命,官位传至子孙,成为上层人物,他的思想意识和记载史迹的“书法”,皆拥护统治阶级,并有巩固它的政权和维持秩序的作用。史官在政治上和社会上接触的人员,大多数是贵族和官僚,其所见、所闻都关涉它们的活动,故所记的事迹同于帝、王、将、相的家谱。这些记载属于史料,并非历史。历史是一门科学,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既有立场观点,也有方法,绝不能以单纯记载充作历史,二者有重大的区别。历史编写虽取材于各种记载,但与记载大不相同。陆懋德于《史学方法大纲》说:

过去的记载,未必全有研究的价值。而研究的价值,全在适应现在之需要。作历史者自必注意当时与现在的关系,而用以做为历史,方能适应现在之需要。由是言之,历史是有时代性的,不但已过的记载不是历史,即已过的历史亦不是历史。例如《史记》在汉代为历史,而在今日则为记载。《通鉴》在宋代为历史,而在今日则为记载。又譬如《公羊传》庄七年所谓“未修春秋”,即是记载,而所谓“已修春秋”,乃是历史。然已修《春秋》在周代为历史,而在今日又为记载。^①

上文强调记载和历史的区别,忽略历史的规律性,使人感觉它不能成为科学,这是片面性的说法。历史是党性极强的科学,有它发展的规律,社会发展受生产方式决定性的影响,经历的阶段不

^① 《史学方法大纲》,页3。

同，历史服务的对象也随着变更，当有重写的必要。另一方面，记载为史料是一事实。史料历时久而数量增加，它的领域逐渐扩大。

史籍的激增 公元前一世纪末叶，全国书籍集中于秘府。刘向父子诸人编纂详细目录，分别群书为七类，而历史书籍数量不多，没有成为独立的一类。二百年后，史籍增加，秘府把群书分为四类，史为一类，位居第三，称为丙部。后重行分类，别为经、史、子、集，史称乙部。隋代中国统一，秘府书籍增加，仍照四部分类。据《隋书经籍志》的记载，四部存书目录，共三千一百二十七部，三万六千七百八卷。历史书籍八百十七部，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卷。书若以部计算，它的卷帙多寡不同，不若以卷计算，尚比较合理。史籍卷数约占总数百分之三十六，遂跃居第一位。

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清乾隆帝广收国内书籍，设局编定《四库全书》。编纂者把历史书籍区别为十五类：一、正史，如《史记》、《汉书》等。二、编年史，如《竹书纪年》、《资治通鉴》等。三、纪事本末，如《通鉴纪事本末》等。四、别史，如《逸周书》等。五、杂史，如《国语》等。六、诏令奏议，如《太祖高皇帝圣训》、《潘司空奏疏》等。七、传记，如《孔子编年》等。八、史钞，如《两汉博闻》等。九、载记，如《吴越春秋》。十、时令，如《岁时广记》等。十一、地理，如《三辅黄图》等。十二、职官，如《唐六典》等，十三、政书，分别为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六属。十四、目录，类分金、石二属。十五、史评，如《史通》等。《隋书经籍志》区别史籍为十三类，《四库全书》增为十五类，二者名目不尽相同。清人分类比较前人显有进步，范围更为广阔，但采用的标准和类别名称，仍有不够明确或内容重复的地方，别史、杂史、记载都是明例。职官、政书显有重复，史钞价值不高，是否可为一类，也有问题。地理虽与历史有关，但是专门学问，没有列入史籍的必要。更当说明的，纪事本末和诏令奏议都是《隋志》所无的类别。传记及政书的领域扩大，内容充实，

远不是隋以前史籍所能及。史籍到了十八世纪中叶，不但数量增加，而且显有进步。这些都是史料，供给我们研究各时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

六经皆史说 史料领域更扩大到经、子、集三部，兹分别说明于下。经居群书的首部，是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和道德标准的书籍，儒生视为永久不变的道理。其实经书所记载的礼教、典章、制度和风俗习惯等，是时代的反映，社会环境的产物，对于二千年前历史研究，提供重要的资料。明儒王守仁首先作了说明，其弟子语录记载师说：“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王守仁更进一步地说：“《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善可为训者时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① 经史都是上层建筑，有维持封建秩序及巩固政权的作用，是一事实，但不是如唯心派学者所说的那样牵强附会。可是王氏首先明确提出“五经亦史”的论点，确是一个贡献。

明代儒学流于空疏，王守仁的论点，未发生应有的影响。清代中叶学者章学诚于《文史通义·易教篇上》发表与王守仁相同的意见。他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六经》若为可信的书籍，不是后人假托或伪造的部分，当然是重要的历史参考资料。其中伪托部分，学者如能考定它写作的年代，也可作为该时代的社会反映，用为参考资料。《六经》皆先王政典，是儒家夸大理想社会的谬论，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应当把《六经》作记载看待，同于史料。章学诚称《六经》为史，显有问题，这也适用于王守仁的说法，但无论如何，史料包括《六经》，是正确的见解，也是史料领域扩大的例证。

^① 《王阳明全集·传习录》上。

子书 儒家思想以外的著作，俗称诸子百家。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学说思想有光辉的发展。公元前二世纪末叶，政府罢斥诸家学说，儒家成为一尊，各派不能继续争论，学说停滞。诸子阐明的学说思想，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兼及政治和人民生活情状，研究我国思想史的学者，固当重视诸子，我们研究历史，也当作为参考资料，补充《史记》记载的不足，《墨子》是一例证。墨子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司马迁叙述他的平生，只有二十四字，并杂有疑辞。我们若读《墨子》，便知道他所到的国家，越王欲封以地，墨子以道不行，不肯往越。他反对战争，倡为兼爱的学说，创造防守的工具，改进守城的技术。当时技巧工人公输般为楚国制造云梯攻宋，墨子闻而立即动身入楚，走了十天，到达楚都，和公输般“斗法”。般新造的攻具不胜墨子使用的守具，以为杀掉墨子，便能破宋。墨子弟子已奉师命持守具入宋，援助宋人守城，楚遂罢兵。这是生动的故事，我们读后深刻了解墨子为人和他不辞劳苦的精神，是子书提供史料的一例。子书范围广泛，天文、算法、医学、农学、艺术、小说、释道等，皆列入子部。其中有自然科学、有文艺作品、有思想活动，是社会各方面发展的表现，都是有用的史料。

集部 我国自印刷技术发明以来，书的数量激增，集部尤为突出。文人常欲其所作的诗文流传于世，孝子顺孙欲其父祖名传于世，常求有名的文学家为他们作传、墓志铭或神道碑。传及墓志等常根据传主或志主的子孙或亲友所作的行述而成。它的缺陷，是本于隐恶而扬善的精神，夸大传主或志主的活动，甚或掩夺他人之功，以为一己之力，或歪曲事实，为传主或墓主的丑恶行为辩护，古人称为“谀墓文”。另一方面，传主的家人或亲友叙述其活动事迹，属于第一手材料，如活动的年月，所处的家庭环境，遭遇的困难及个人对于时事的看法，常有参考的价值。文学家的文集中，传、墓志铭及神道碑等常占主要部分，是有用的历史资料。集中选入的诗